

莫迪执政以来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日常化及影响

王 凯

摘要：民族主义的日常化是国家实现民族认同的重要途径，主体民族可以从叙事话语、制度规范和生活实践三个层次推动民族主义的日常化。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执政以来，积极推动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日常化。从叙事话语层次，塑造印度教主体民族的正统性与合法性；从制度规范层次，在全国范围推行印度教特性的政策法令；从生活实践层次，推进日常生活领域的“橘黄色化”。日常化集中反映了印度教民族主义发展演变的新特点，包括从相对隐蔽转向直接公开，从外围边缘走向主流地位；从传统的社会“自下而上”的发展模式转变为社会“自下而上”和政府“自上而下”并行的发展模式；呈现“硬印度教特性”与“软印度教特性”相互配合的两面性。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日常化对印度内政外交产生深刻影响，在国内政治层面，长期占据印度主流意识形态的世俗主义已逐步让位于印度教民族主义，印度民主制度受到持续冲击，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对立冲突不断激化，印度政治极化和社会撕裂程度进一步加深。在对外关系层面，推动改变了印度对自身国际地位和外交立场的认识判断，印度对外政策日趋激进和强硬。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印巴关系持续紧张升级，并增加了中印关系的不稳定和不确定性。

关键词：印度教民族主义；日常民族主义；莫迪政府；印度人民党；国民志愿服务团

收稿日期：2022-10-16

作者简介：王凯（1989-），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四川行政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领域：印度国内政治与政党政治。

2014年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执政以来，印度国内政治社会环境加速右转，以印度教特性为核心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再次迅猛崛起，^①逐渐成为影响当代印度政治格局的主导性力量。同时，印度社会、文化和教育等公共领域的“橘黄色化”趋势也

^① 1923年，萨瓦卡（V.D. Savarkar）发表《印度教特性》（*Hindutva*）一书，首次提出印度教特性（Hindutva）概念。Hindutva是在Hindu（印度教徒）后面加上梵语后缀“tva”，相当于英语后缀“ness”，在英文含义上与Hinduness最为接近。印度教特性强调地理、种族、宗教、文化和语言的统一，可以概括为一个国家（印度斯坦）、一个种族（雅利安人）、一种宗教（印度教）、一种文化（吠陀文明）、一种语言（梵语），试图建立印度教在政治社会生活中的主导性地位。

《南亚东南亚研究》2023年第1期，第16—29页。

愈加明显。^①印度自独立以来以世俗主义为立国原则，并被国际社会视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然而，随着印度教民族主义上升为主流意识形态，印度的民主正在走向“多数主义的统治”甚至威权主义。印度教民族主义起源于19世纪后期的印度民族独立运动，在独立后国大党“一党独大”统治时期，始终被政府压制并长期处于政治体系的边缘地位。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大党转向机会主义政策路线，不断操纵教派政治议题，世俗主义原则被极大削弱，印度教民族主义借势崛起，印度人民党也随之迅速发展壮大并成为全国性政党。2014年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获得绝对多数选票并执政，印度教民族主义再次迅猛崛起，从相对边缘快速跻身主流地位。与20世纪80年代不同，莫迪执政以来，印度教民族主义从政治空间迅速扩散至社会、文化和教育等公共领域，发展速度、规模和渗透范围前所未有的，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当代印度政治社会发展走向，进而外溢影响到印度对外政策。

关于莫迪执政以来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新变化和新趋势，有学者指出印度教民族主义正在走向日常化，并相应地提出“新印度教特性”概念。^②日常化是民族主义发展演变的特定阶段和形式，能够从机制和规律层面，有效解释莫迪执政以来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新变化和新趋势，进而挖掘印度教民族主义发展演变的特殊性和普遍意义。因此，本文尝试构建一个基于民族主义日常化的解释框架，梳理历史上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发展演变过程，在此基础上，重点探讨莫迪执政以来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日常化、主要特点及对印度内政外交的影响。

一、民族主义的日常化：初步解释框架

日常民族主义的概念由英国学者迈克尔·比利格提出，^③主要指民族国家建立之后，那些常规的、不被注意但又普遍存在的实践和思想习惯，能够实现民族性的日常再现，强化民族认同。日常民族主义既体现在“我们”、祖国、国家利益、爱国主义等话语体系层面，也体现在国旗、官方语言、货币和地名等日常生活层面。与民族解放运动、法西斯主义、宗教民族主义等活跃的民族主义不同，日常民族主义代表了民族主义相对特殊和温和的一面。正如比利格所言，日常民族主义的换喻形象不是一面在狂热激情下被有意识挥舞的旗帜，而是一面在公共建筑上悬挂的、不

^① 橘黄色是印度教的标志颜色，因此，学界通常把印度教民族主义对印度社会政治的渗透和影响称为“橘黄色化”（Saffronisation）。

^② 参见 Anderson Edward, “‘Neo-Hindutva’: The Asia House M. F. Husain campaign and the mainstreaming of Hindu nationalist rhetoric in Britain”, *Contemporary South Asia*, Vol.23, No. 1, 2015, pp.45-66; Anderson Edward and Arkotong Longkumer, “‘Neo-Hindutva’: Evolving Forms, Spaces, and Expressions of Hindu Nationalism”, *Contemporary South Asia*, Vol. 26, No. 4, 2018, pp.371-377.

^③ 1995年，迈克尔·比利格（Michael Billig）出版《日常民族主义》（*Banal Nationalism*）一书，首次提出日常民族主义的概念。详见 Michael Billig, *Banal Nationalism*, SAGE Publications, 1995。

被注意的旗帜。^①在一定程度上,如果说活跃民族主义是推动民族国家形成的引擎,那么日常民族主义则是维持民族认同的纽带。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指出,民族主义不是与共产主义或自由主义类似的另一种意识形态,而是对世界想象的普遍方式,民族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②由此可见,民族认同以“民族的想象”为基础和前提,只有在日常生活场景才会不断产生和再现,“民族的想象”不能仅靠意识形态的建构来维持,而是要转化为民族成员的日常生活实践。^③因此,民族主义的日常化是国家维持民族认同的重要途径。

对于多族群国家而言,当占支配地位的族群取得国家地位即拥有自己的政治组织形式之后,就会转化为族群民族,^④并试图建立由该族群民族统治的单一民族国家。然而,主体民族将面临其他处于少数地位族群的潜在威胁和挑战。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认同,主体民族要么选择杀戮、驱逐少数族群,要么将其同化。^⑤杀戮和驱逐属于活跃民族主义的行动策略,同化则属于日常民族主义的行动策略。杀戮和驱逐虽然快速直接,但大概率上会造成严重的族群冲突,不利于国家稳定且不具有可持续性。相比之下,同化虽然间接缓慢,但一般不会造成大范围的社会冲突,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塑造民族认同,并具有一定的长期效应。实际上,活跃民族主义也是以日常民族主义为基础,正因为民族主义在普通和日常的形式中不断产生并再现,才可以用于政治目的和关键时期的动员。^⑥因此,多族群国家的主体民族通常选择民族主义日常化的途径强化民族认同,巩固自身的合法性和统治地位。

民族主义日常化的主要方式分为三个层次:叙事话语、制度规范和生活实践。第一,叙事话语层次。泰德·麦卡利斯特指出,我们讲述什么样的故事决定了我们成为什么样的民族。^⑦因此,主体民族可以通过改写历史,重新进行国家叙事,构建有利于主体民族的宣传话语体系,赋予自身正统性和合法性。同时,主体民族还可以制造与少数族群的二元对立,助长相互对立和仇恨情绪,不断压缩少数族群的生存空间,将其推向边缘化。第二,制度规范层次。主体民族可以制定公共政策或颁布法律法规,将自身的行为方式和规范合法化甚至神圣化。同时,否定少数族群特定行为方式或规范的合法性,取消其享受政策优待等“特殊地位”,并强迫少数族群

① Michael Billig, *Banal Nationalism*, AGE Publications, p.8.

② 参见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s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Verso, 1983。

③ 参见 Orvar Löfgren, “The Nationalization of Culture,” *Ethnologia Europaea*, Vol. 3, No. 1, 1991, pp.35-53。

④ 庞中英:《族群、种族和民族》,《欧洲》,1996年第6期,第9-10页。占支配地位的族群所形成的族群民族可称为主体民族,如无特别说明,本文所称主体民族均为该含义。

⑤ [英]厄内斯特·盖尔纳著,韩红译:《民族与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⑥ Craig Calhoun, “The Rhetoric of Nationalism,” in Michael Skey and Marco Antonsich (eds.), *Everyday Nationhood: Theorising Culture, Identity and Belonging after Banal Nationalism*,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p. 19.

⑦ Ted McAllister, “The Stories We Tell — The People We Become,” The Russell Kirk Center for Cultural Renewal, December 20, 2019, <https://kirkcenter.org/essays/the-stories-we-tell-the-people-we-become/>.

服从主体民族的制度规范。第三，生活实践层面。主体民族可以将民族主义渗透到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实践中，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持续发挥作用。例如，与大众生活息息相关的语言、货币、宗教仪式、节日、地理标志和日常用品等，都可以成为民族主义日常化的重要载体和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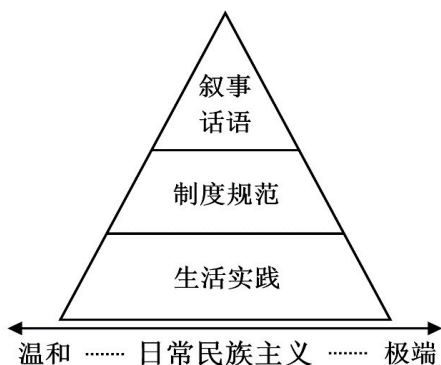


图1 民族主义日常化的三个层次

民族主义日常化的三个层次可以用金字塔结构表示（图1），其中，叙事话语处于最顶层，代表民族主义日常化的顶层设计。制度规范处于中间层次，是联系叙事话语与生活实践层次的中介。生活实践处于最底层，是民族主义日常化的实践基础。另外，与活跃民族主义相比，尽管日常民族主义的形式较为“隐蔽”，但也具有“善良”与“邪恶”的两面性，是一个从温和到极端的连续体。日常民族主义既

能够有效增强民族认同和爱国主义精神，也可以重塑政治社会环境和民众心理结构，进而实现对国家和社会的全面控制。

二、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发展演变过程

印度教民族主义起源于19世纪后期的印度民族独立运动，具有典型的反英国殖民统治和复兴印度教文化的底色。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发展演变与主要的印度教社会运动组织、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党活动情况密切相关，特别是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印度人民党（印度人民同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着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发展演变过程。^①概括来说，印度教民族主义自产生以来，先后经历了英国殖民时期、印度独立初期、国大党统治时期和印度人民党时期四个主要发展阶段。

（一）英国殖民时期

19世纪梵社和雅利安社等印度教组织相继成立，印度教民族主义开始萌芽。20世纪初期，以印度教大斋会和国民志愿服务团等为代表的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陆续出现，标志着印度教民族主义逐步发展壮大。然而，由于英国殖民政府的镇压控制，印度教民族主义发展过程明显受限。同时，由于没有建立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党直接参与政治，缺乏有效的政治机会，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影响范围仅限于社会文化领域，并不具备有效的政治影响力。印度独立运动期间，以国大党为代表的印度民族主义

^① 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RSS）成立于1925年，是印度规模最大的右翼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和众多分支组织构成了团家族。印度人民党的前身是1951年成立的印度人民同盟，是国民志愿服务团的政治分支组织。另外，印度前总理瓦杰帕伊（A. B. Vajpayee）和现任总理莫迪均出身国民志愿服务团。

发挥主导作用，而印度教民族主义则处于相对边缘化地位。

（二）印度独立初期

印度独立之后，国大党获得合法执政党地位。由于国大党坚持世俗主义的建国原则，世俗主义长期成为印度国内主流意识形态。1948年，国民志愿服务团被指控参与谋杀圣雄甘地，被国大党政府认定为非法组织并取缔。此后，印度教民族主义运动受到全面镇压，印度教民族主义发展遭遇空前阻力。为争取扩大政治机会，国民志愿服务团于1951年成立新的政党——印度人民同盟，通过与其他政党建立联盟的方式正式参与政治。人民同盟的成立是印度教民族主义发展历程上的重要分水岭，自此之后，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发展势头便与人民同盟的政治命运息息相关。

（三）国大党统治时期

自1947年印度独立至20世纪70年代末是国大党统治时期，印度政治格局呈现国大党“一党独大”的基本特征。其间，国大党在中央和地方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国民志愿服务团与人民同盟通过竞选动员的方式保持合作，致力于挑战甚至取代国大党的执政地位。然而，由于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色彩过浓，人民同盟长期被其他政党视为“政治的不可接触者”。尽管人民同盟具备一定的政治影响力，但在整个政治体系中始终处于边缘地位。1975年，英迪拉·甘地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国民志愿服务团第二次被政府取缔。1977年，人民同盟与其他反对党形成竞选联盟并赢得大选，建立了印度独立后首个非国大党政府——人民党政府。人民同盟首次正式参与中央政府执政，国民志愿服务团的宣传干部也首次进入中央政府内阁。至此，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政治机会较此前有效扩大。

（四）印度人民党时期

1980年，原人民同盟成员退出人民党成立印度人民党。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民志愿服务团、世界印度教大会和印度人民党开始分工合作，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动员，特别是罗摩出生地运动迅速转化为选举政治红利，印度人民党迅速发展壮大。^①瓦杰帕伊政府的建立标志着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党首次在中央正式执政，印度教民族主义迎来空前的政治机会，积极尝试通过政府层面推动重建罗摩庙、废除宪法第370条和制定统一民法等核心议程。^②然而，由于瓦杰帕伊政府是全国民主联盟组建的少数党联合政府，执政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和政策立场差异较大。同时，印度人民党与国民志愿服务团也存在意识形态纯洁性之争，因此，印度教民族主义势

^① 1991年印度人民党成为议会最大反对党，1996年成为议会第一大党，1998年，成功组建联合政府并执政，1999-2004年，瓦杰帕伊政府完成首个五年任期。

^② 印度宪法第370条是一则临时条款，赋予查谟和克什米尔邦的“特殊地位”，包括拥有自己的宪法和除国防、通讯和外交事务以外的决策权。由于该邦是印度唯一一个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邦，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一直呼吁取消其“特殊地位”。2019年8月5日，印度政府废除宪法第370条，将原查谟和克什米尔邦拆分为查谟和克什米尔、拉达克两个联邦属地。

力对政府决策的影响比较有限。总体而言，印度教民族主义成为与世俗主义相对、发展强劲的竞争性意识形态，但尚未取代世俗主义正式跻身主流地位。

三、莫迪执政以来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日常化分析

印度是一个典型的多族群国家，具体表现在多种姓、多宗教、多语言、多人种。其中，印度教徒占总人口的 79.8%，是在人口规模上处于支配地位的族群。穆斯林占总人口的 14.2%，是人口规模最大的少数民族。^① 印度独立之后，尼赫鲁等政治精英在国家制度和理念设计中，极力回避“民族”“族群”等可能引起分离或离心的政治想象，坚持印度民族国家的统一性。^② 因此，反殖民的印度民族主义和世俗主义处于国家政治生活的主导地位，而宗教色彩浓厚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则长期处于边缘地位。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国大党执政地位相对衰落、身份政治日渐兴起以及世俗主义原则不断削弱，印度教民族主义借机迅速发展壮大。印度人民党发展为全国性政党并在中央执政，国民志愿服务团的政治影响力也随之不断提升。印度教民族主义强调印度教主体民族的集体身份认同，大力复兴印度教文化，并试图建立由印度教统治的国家。2014 年莫迪执政以来，印度教民族主义发展态势更加迅猛，从政治领域不断扩展到社会、文化和教育等公共领域，并逐渐上升为主流意识形态。总之，这一时期印度教民族主义在叙事话语、制度规范和生活实践层次全面走向日常化。

（一）叙事话语：塑造印度教主体民族的正统性与合法性

叙事话语层次属于民族主义日常化的顶层设计，其中，最核心的是证明主体民族的正统性和合法性。因此，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历史叙事和宣传话语体系也围绕这一核心目标。同时，印度教主体民族还将穆斯林等少数民族群视为外来威胁和挑战，制造二者的对立冲突和仇恨情绪，将少数民族群日益推向边缘化。

长期以来，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认为雅利安人是南亚次大陆的原住民，印度教徒是雅利安人的后裔，印度教是诞生于南亚次大陆的本土宗教。然而，由于历史证据和研究发现与其历史观不符，^③ 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便尝试改写历史，极力塑造印度教主体民族的正统性与合法性。莫迪执政之后，大量具有国民志愿服务团背景的人员和印度教民族主义激进派担任印度主要教育、科研和文化机构负责人，为改写历史

① 该数据源于印度最近一次（2011 年）人口普查公布数据，参见 <https://www.census2011.co.in/religion.php>，因新冠疫情等原因，最新（2021 年）人口普查数据尚未正式公布。

② 和红梅、周少青：《印度民族国家构建中应对复杂多样性的政治策略及其效果》，《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9 年第 6 期，第 10 页。

③ 现有研究表明，雅利安人于公元前 2000 年至公元前 1000 年进入南亚次大陆，并非南亚次大陆原住民。

创造便利条件。^①2014年8月，全印历史编纂计划组织宣布完成四项研究计划，^②包括探寻印度教圣河——萨拉什瓦蒂河的地理位置，证实雅利安人是南亚次大陆原住民，确定史诗《摩诃婆罗多》的完成日期和关于1857年民族大起义的研究。该组织长期致力于以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历史观改写历史，成为莫迪执政以来积极推进改写历史的核心组织。此外，2017年9月，在印度文化部部长马赫什·夏尔马的支持下，莫迪政府成立专家委员会，计划通过考古发现和遗传信息确认印度教徒是南亚次大陆原住民的后裔，甚至试图证明印度教经典并不是神话传说，而是历史事实。^③

莫迪政府还通过国家教育研究和培训委员会项目对公立学校的教材内容进行大量修改，^④删除与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相悖的内容，替换成符合其历史叙事的版本。据统计，在2014年至2018年间，该项目对2005年至2009年间出版的182本教材累计进行了1334处修改。^⑤修改新增的内容包括赞颂印度历史上的印度教统治者，将穆斯林统治者妖魔化和污名化，强调伊斯兰教以杀戮的方式进行传教，将基督教传教士的传教活动视为阴谋等等。在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历史叙事框架下，甘地和尼赫鲁等重要人物的历史地位被人为降低，对萨瓦卡、海德格瓦（K.B. Hedgewar）、格尔瓦卡（M.S. Golwalkar）等印度教民族主义代表人物的评价则过分拔高，甚至被奉为印度民族英雄。

印度教右翼的历史叙事是其力图塑造印度国族认同的重要工具，也是构成印人党政府最重要的合法性来源之一。^⑥印度内政部部长阿米特·沙阿曾表示对历史进行整合、修饰和改写是人民和历史学家的责任。他强调印度的历史应该从印度教民族主义的视角进行改写，代表着政府层面对改写历史行为的默许和支持。实际上，早在瓦杰帕伊政府时期，印度教民族主义势力就通过修改历史教科书的方式改写历史。例如，国民志愿服务团成员高士（Nathuram Godse）刺杀甘地的事件被从教科书中删除，激进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被视为做出重要贡献的历史人物。总之，莫迪执政以来，

① 主要有印度历史研究委员会（ICHR）主席苏达山·拉奥（H.V. Sudarshan Rao）、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ICCR）主席拉克什·钱德拉（Lokesh Chandra）、英迪拉·甘地国家艺术中心（IGNCA）主席罗摩·巴哈杜尔·雷（Ram Bahadur Rai）、国家图书托拉斯（NBT）主席巴尔德夫·夏尔马（Baldev Sharma）、尼赫鲁纪念馆 & 图书馆（NMML）主席沙克蒂·辛哈（Shakti Sinha）、印度高等研究院（IAS）主席卡皮尔·卡普尔（Kapil Kapoor）和院长马卡兰德·帕兰杰普（Makarand Paranjape）。

② 全印历史编纂计划（ABISY）成立于1978年，是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的分支组织，主要目标是根据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历史观编纂改写历史。

③ Rupam Jain and Tom Lasseter, "By rewriting history, Hindu nationalists aim to assert their dominance over India," *Reuters*, December 30, 2019, <https://www.reuters.com/investigates/special-report/india-modi-culture/>.

④ 国家教育研究和培训委员会（NCERT）成立于1961年，为隶属于中等教育中央委员会（CBSE）的学校提供从1到12年级的教材。

⑤ Christophe Jaffrelot and Pradyumna Jairam, "BJP Has Been Effective in Transmitting Its Version of Indian History to Next Generation of Learners," *The Indian Express*, February 20, 2020, <https://indianexpress.com/article/opinion/columns/education-ours-and-theirs-6121982/>.

⑥ 杨怡爽：《朝“美好”的过去前进：印度教右翼的历史观》，《世界知识》，2020年第5期，第33页。

印度人民党政府与国民志愿服务团深化分工合作，试图根据印度教民族主义历史叙事框架全面改写历史，甚至将史诗神话转变为历史事实，重建吠陀时代“罗摩之治”下的印度教国家，这种做法实际上建立在历史虚无主义基础之上。

在对待主体民族与少数族群的地位关系上，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坚信印度教徒是所有印度人的共同祖先，“印度母亲”是所有印度人的祖国和信仰圣地，穆斯林等少数族群则被视为外来侵略者和“二等公民”。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夸大穆斯林人口的实际增长速度，并将其与恐怖主义、分离主义相提并论，试图在印度社会制造一种广泛的“伊斯兰恐惧症”。部分印度穆斯林群体表示受到的威胁感和压迫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印度长期坚持世俗主义原则的初衷是对穆斯林等少数族群的保护，然而，在印度教民族主义主导的宣传话语体系中，世俗主义被贴上“伪世俗主义”的负面标签，成为“顾此失彼”即“保护穆斯林忽视印度教徒”的不公平政策。

另外，作为国家领导人，印度总理莫迪个人叙事话语也体现出印度教民族主义的特点。例如，他在众多场合的演讲中反复强调“婆罗多母亲必胜”，并宣称印度的大国梦就是恢复吠陀时代的历史地位，成为“世界领袖”。不难发现，在印度官方和民间关于印度的日常表达中，越来越多地使用印度教色彩浓厚的“婆罗多”（Bharat）而不是印度（India）。一切印度教民族主义的目标和行动，似乎都被提升至国家利益之上和爱国主义的道德高度，一切反对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想和力量都被视为“异类”甚至是“反国家”的。总之，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历史叙事和宣传话语体系，都在围绕着构建印度教主体民族身份认同这一“想象的共同体”。

（二）制度规范：在全国范围推行印度教特性的政策法规

印度教特性是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核心价值追求，由于与印度教的天然联系，在实践中难以摆脱教派主义的负面形象。为此，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试图淡化二者的关系，把印度教特性等同于印度多元文化的“统一体”和一种生活方式，^①以印度教特性作为印度人的身份标志，并称之为文化民族主义，这种做法实质上是以文化的外衣掩盖宗教的内核。莫迪执政以来，印度人民党政府制定出台多项带有明显印度教特性色彩的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从制度规范层面推动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日常化。相关法律政策将印度教特性的行为规范上升为全国统一标准并强加给穆斯林等宗教少数群体，印度多元包容的文化传统和国家治理原则明显削弱，印度教主体民族与少数族群的对立冲突也不断加剧。相关印度教特性的法律政策包括在全国范围推行屠牛

^① 1995年12月，印度最高法院判决指出，印度教特性与印度教宗教教义无关，是一种生活方式（Way of Life），并将其等同于印度化（Indianization）。

禁令、《反改宗法》和《公民身份修正法案》^①等，其中，以屠牛禁令最具代表性。

牛类尤其是母牛在印度教中具有神圣和崇高的地位，因此，禁止屠牛是印度教民族主义者长期坚持的核心议题。^②禁止屠牛问题同时涉及宗教情感、经济理性和文化政治，历来备受争议。^③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希望改变部分地区禁止屠牛的局面，推动实现在全国范围内统一禁止屠牛。然而，在印度独立后的数十年间，关于禁止屠牛的立法并没有实质性进展。莫迪执政以来，中央和各邦政府先后通过立法，不断扩大禁止屠牛的范围并加大惩罚力度。例如，2015年3月，马哈拉施特拉邦《1995年动物保护修正案》终在20年后经总统批准生效，修正案将禁止屠宰范围从母牛扩大至小牛、公牛和阉牛。同时，修正案加大相关处罚力度，将触犯该法的罪行改为不可保释，处罚从6个月监禁提高至5年，罚金从1000卢比增加至1万卢比。^④哈里亚纳邦先后通过法案，规定在本邦范围内全面禁止牛肉交易和牛类屠宰，对触犯者处以3万到10万卢比的罚款以及3到10年的监禁。^⑤哈里亚纳邦也成为全印屠牛禁令最为严苛的邦之一。2017年3月，印度人民党赢得北方邦选举，印度教民族主义强硬派约吉·阿迪蒂亚纳特出任首席部长。为兑现竞选承诺，他随即宣布关停所有非法屠宰场，并计划全面禁止牛类屠宰。2020年6月，北方邦政府通过禁止牛类屠宰修正案草案，规定触犯者最高处以10年监禁和50万卢比罚款。^⑥

印度宪法中关于保护牛类的内容属于邦政策指导原则，^⑦印度独立后各邦通过一些禁止屠牛的法案。然而，相关法案的适用范围和处罚力度宽严不一，并未形成全国范围的统一局面。莫迪执政以来，通过禁止屠牛法案的邦不断增加，处罚范围逐

① 2019年12月，莫迪政府出台《公民身份修正法案》，该法案规定，2014年12月31日前因受宗教迫害逃离巴基斯坦、孟加拉国、阿富汗等国来到印度的印度教徒、锡克教徒、佛教徒、耆那教徒、帕西人和基督教徒移民，如果在印居留时间超过五年，可申请加入印度国籍，但穆斯林不在规定范围之内。法案在印度各地引发大规模抗议和骚乱。

② 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强调保护的牛类主要指旱牛（Cattle），包括母牛（Cow）、小牛（Calf）、公牛（Bull）、阉牛（Bullock）等，但不包括水牛（Buffalo）。

③ 吴晓黎：《解析印度禁屠牛令争议——有关宗教情感、经济理性与文化政治》，《世界民族》，2016年第5期，第77-89页。

④ Makarand Gadgil and Venkat Ananth, "Maharashtra joins beef ban club," *LiveMint*, March 10, 2020, <https://www.livemint.com/Politics/kdviotCsRqMIDFBPGMhBmK/Maharashtra-bans-beef-5-year-jail-term-for-sale-or-possessi.html>.

⑤ PTI, "After beef ban, Haryana Assembly passes Bill banning cow slaughter," *The Economic Times*, March 15, 2020, <http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news/politics-and-nation/after-beef-ban-haryana-assembly-passes-bill-banning-cow-slaughter/articleshow/46587574.cms>.

⑥ PTI, "Uttar Pradesh govt. clears ordinance to prevent cow slaughter," *The Hindu*, June 10, 2020, <https://www.thehindu.com/news/national/other-states/uttar-pradesh-govt-clears-ordinance-to-prevent-cow-slaughter/article31792688.ece>.

⑦ 印度宪法第48条属于邦政策的指导原则（Directive Principles of State Policy），其中写明，国家应努力按照现代科学方式发展农业和畜牧业，特别要采取措施保护并改良奶牛、牛犊及其他产奶和役用牛类的品种，同时，禁止进行屠宰。

步扩大，处罚力度也不断升级。目前，印度大多数邦均已不同程度地立法限制或禁止牛类屠宰。^① 由于大量穆斯林和达利特以牛类屠宰和皮革制造为生，屠牛禁令对相关群体的收入和生活造成明显影响。此外，屠牛禁令还导致“护牛私刑”泛滥。穆斯林和达利特等因从事牛类运输、交易或屠宰等原因，被所谓的“圣牛保护者”暴力殴打致死的事件屡次发生，屠牛禁令越严格的地区，“护牛私刑”活动越为严重。中央和各邦政府及警察往往放任此类行为，肇事者也通常免于处罚，甚至还被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所宣传称赞。

莫迪政府还通过立法否定穆斯林和基督教徒部分行为方式和规范的合法性。例如，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一直呼吁废除穆斯林属人法，建立统一民法取代少数族群的宗教律法。2019年7月，莫迪政府正式废除穆斯林“三声离婚”制度，^② 在推动建立统一民法上迈出关键一步。同时，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认为穆斯林和基督教徒对印度教徒的改宗行为非法，导致分离主义滋生，威胁国家安全。为此，中央邦、古吉拉特邦和奥迪萨邦等多个邦先后出台反改宗法，^③ 莫迪政府还计划在全国统一推行，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限制民众选择宗教信仰的自由权利。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回家”^④（Ghar Wapsi）方式从其他宗教改回印度教信仰的行为不受反改宗法限制，反映了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对待改宗问题上的“双重标准”。此外，在莫迪政府相关政策法案中，穆斯林往往被视为特殊群体而区别对待，难以享受正常国民待遇。2019年12月，印度议会通过《公民身份修正法案》，规定印度教徒以及其他宗教少数群体的外来移民可申请加入印度国籍，而唯独穆斯林被排除在外。

（三）生活实践：推进日常生活领域的“橘黄色化”

生活实践是日常民族主义的实践基础，也是推动民族主义日常化最直接的途径。莫迪执政以来，印度教民族主义者通过宣传瑜伽、推广印地语和修改地名等方式，以国家官方政策的名义，推动印度教民族主义向民众日常生活领域渗透，逐步实现日常生活领域的“橘黄色化”。

2014年莫迪政府成立瑜伽部并指出，瑜伽是源自公元前2700年印度河流域的不朽文化遗产，应以弘扬民族文化遗产的名义在全国大力推广。国民志愿服务团发言人曼莫汉·维迪亚表示，瑜伽是印度古代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我们通过大规模地庆祝

① 截至目前，西孟加拉邦、喀拉拉邦、阿萨姆邦、米佐拉姆邦、梅加拉亚邦、特里普拉邦、那加兰邦、锡金邦、伪“阿鲁纳恰尔邦”（印非法占据我藏南地区），尚未立法禁止牛类屠宰。

② “三声离婚”是指根据穆斯林律法，男子只需通过口头、电话、短信、社交媒体或邮件，重复说出或打出三遍“Talaq”（离婚），便可单方面解除婚姻关系。

③ 反改宗法规定，禁止通过武力、虚假陈述、不正当手段、强迫、引诱以及包括结婚在内任何欺骗性手段的改宗行为。目前，中央邦、古吉拉特邦、奥迪萨邦、恰蒂斯加尔邦、喜马偕尔邦、北阿坎德邦、伪“阿鲁纳恰尔邦”已经通过反改宗法。

④ “回家”（Ghar Wapsi）是指通过印度教的宗教“净化”仪式，将改宗为其他宗教信仰的人改回印度教，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称之为“回家”。

瑜伽活动来印证光辉的历史。^①莫迪政府要求政府机构、学校等统一练习瑜伽，并在全国范围开展宣传庆祝活动。同时，还将瑜伽作为印度的文化标识在国际社会宣传推介。2014年联合国将6月21日确定为国际瑜伽日。2016年，瑜伽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依靠动员民众投票支持莫迪和推广瑜伽活动，印度教民族主义激进派、瑜伽师巴巴·兰德福的个人影响力迅速提升。然而，政府大范围推广瑜伽也引起了穆斯林群体的抵触，他们认为推广瑜伽是增强印度教徒荣耀而将穆斯林边缘化的同化策略。全印穆斯林属人法委员会副秘书长阿卜杜·拉辛·库雷西表示，推广瑜伽是“将印度教仪式强加给非印度教徒。”

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视梵语为语言的精华，认为印地语继承了梵文的精髓与灵魂，大力提倡将印地语确立为国家官方语言。然而由于现实种种原因，这一目标始终没有实现。莫迪执政后积极推行印度教民族主义的语言政策，莫迪本人在国内外公开场合通常只讲印地语，并要求政府官员在日常交流和社交网站上也使用印地语。同时，莫迪政府将部分公共标识由英语改为印地语，^②并计划在东北部和南部等非印地语地区继续推广印地语。2019年印地语日活动期间，莫迪和阿米特·沙阿用印地语发表推特，称赞印地语作为民族语言的简洁性，并将印地语称为印度人的身份标志。此外，莫迪政府在2019年国家教育政策草案中规定，印地语作为非印地语地区学校必修的第三语言，后因南部各邦集体抵制而被迫撤销。达罗毗荼进步联盟（DMK）主席卡鲁纳尼认为，莫迪政府赋予印地语优先地位意味着差别对待非印地语人群，并使其沦为“二等公民”。^③

此外，莫迪政府还根据印度教历史文化传统，通过修改城市街道等地理标志名字的方式，推动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日常化。莫迪政府先后修改部分城市、街道、机场和火车站名称，凸显印度教历史文化的主导地位，抹杀穆斯林历史文化印记。例如，北方邦城市阿拉哈巴德（Allahabad）被改为普拉亚格拉杰（Prayagraj），^④法扎巴德（Faizabad）被改为阿约迪亚（Ayodhya）。位于瓦拉纳西（Varanasi）的莫卧儿撒拉火车站（Mughalsarai Station）被改为丁达雅尔·乌帕德雅亚枢纽站（Deen Dayal Upadhyay Junction）。首都新德里的奥朗则布路（Aurangzeb Road）被改为阿布杜尔·卡兰路（Abdul Kalam Road）。^⑤哈里亚纳邦的古尔冈（Gurgaon）被改为古鲁格

^① Rupam Jain Nair and Andrew MacAskill, "India PM Modi's yoga offensive gets Muslims stressed," *Reuters*, June 18, 2020,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india-yoga-idUSKBN0OW0JU20150616>.

^② 例如，2017年3月，泰米尔纳德邦国家公路里程碑文字统一由英语改为印地语。

^③ PTI, "Narendra Modi govt orders promotion of Hindi in all departments," *Financial Express*, June 22, 2020, <https://www.financialexpress.com/archive/narendra-modi-govt-orders-promotion-of-hindi-in-all-departments/1262346/>.

^④ 阿拉哈巴德意为“安拉的城市”，1583年莫卧儿王朝阿克巴为其命名。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认为该城市是印度教圣地，因此参照印度教典籍中的圣地普拉亚格，要求其更名为普拉亚格拉杰。

^⑤ 奥朗则布是莫卧儿王朝的第六任皇帝，阿布杜尔·卡兰是印度科学家，被誉为“印度导弹之父”，曾任印度第11届总统。

拉姆（Gurugram）。^① 位于查谟的乔克（Chowk）被改为印度母亲乔克（Bharat Mata Chowk），查谟机场（Jammu Airport）被改为玛哈拉贾哈里·辛格查谟机场^②（Maharaja Hari Singh Jammu Airport）。同时，印度人民党执政的部分邦还在计划修改相关地名。实际上，印度独立后修改城市等名称的做法并不少见，但此前主要是修改体现英国殖民历史的英语名称。^③ 莫迪执政以来则试图完全去除反映穆斯林统治历史的城市名称，体现了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反穆斯林”的一贯立场。

四、印度教民族主义日常化的主要特点及影响

莫迪执政以来，印度教民族主义几乎全面走向日常化，标志着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日常化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既反映了日常民族主义的一般规律和特征，也呈现出显著的特殊性以及不同于以往历史时期的诸多新特点。同时，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日常化对当代印度内政和外交均产生深刻影响。

（一）印度教民族主义日常化的主要特点

第一，印度教民族主义从相对隐蔽转向直接公开，从外围边缘走向主流地位。印度独立以来，印度教民族主义被主流世俗主义框架所不容，长期处于外围边缘地位。为改善教派主义负面形象，国民志愿服务团等组织公开表示支持世俗主义原则，并采取相对隐蔽的活动形式。印度人民党也尝试淡化意识形态的行动路线，通过与其他政党联盟的方式参与政治活动。然而，莫迪执政以来，随着印度人民党在中央和地方执政地位的巩固，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政治机会空前扩大，在“官方背书”的有利条件下日渐走向公开化，并迅速跻身主流意识形态地位。莫迪政府忽视少数族群利益和情感，公开宣扬“印度教至上”的文化霸权主义，在对涉及族群冲突等敏感历史事件的评价和定性时，往往歪曲事实，文过饰非。例如，针对2002年古吉拉特邦印穆冲突事件，^④ 莫迪政府始终坚持强硬立场并推卸责任，印度最高法院最终做出莫迪无罪的判决。印度教民族主义势力缺乏有效制衡，以至于可以直接干预印度司法公正。

第二，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发展模式发生转变，从传统的社会“自下而上”的发展模式转变为社会“自下而上”和政府“自上而下”并行的发展模式。传统上印度教民族主义势力处于制度化政治体系之外，没有建立有效的政治沟通和参与渠道，主要依托国民志愿服务团等民间社会运动组织，从社会层面“自下而上”推动实现

^① 古鲁格拉姆源自古鲁德罗纳查亚（Guru Dronacharya），是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中的印度教高种姓。

^② 玛哈拉贾·哈里·辛格是查谟-克什米尔土邦多格拉王朝末代王公。

^③ 例如，孟买由Bombay改为Mumbai，马德拉斯由Madras改为Chennai，加尔各答由Calcutta改为Kolkata，班加罗尔由Bangalore改为Bengaluru。

^④ 2002年2月，古吉拉特邦戈德拉火车站的一列火车被纵火，造成59人丧生，列车乘客主要是印度教徒。印度教徒宣称是穆斯林蓄意纵火，此后古吉拉特邦发生了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大规模冲突骚乱。当时莫迪担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但政府和警察放任不作为，骚乱升级为针对穆斯林的报复屠杀，共造成1000余人丧生，该事件也被称为“古吉拉特大屠杀”。

复兴印度教文化、建设印度教国家的社会变革目标。莫迪执政以来，印度政治格局呈现出印度人民党“一党独大”的发展态势，一个新的主导型政党体制正在形成。在国民志愿服务团与印度人民党的分工合作之下，印度教民族主义逐步形成了社会“自下而上”和政府“自上而下”并行的发展模式。莫迪政府依托执政资源大力推动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日常化，废除“三声离婚”制度，废除宪法第370条，出台《公民身份修正法案》等，均离不开莫迪政府主导性力量的推动。因此，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日常化是政府与社会上下联动、相互配合的结果。

第三，日常化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呈现“硬”和“软”的两面性。莫迪执政以来，“硬印度教特性”与“软印度教特性”相互配合，^①成为日常化印度教民族主义“硬币的两面”。一方面，激进的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在政府默许纵容下，以宗教和种族的名义实施暴力活动，不断制造恐惧和仇恨。例如“护牛私刑”等针对少数族群的人身攻击频繁发生，这属于典型的“硬印度教特性”。另一方面，莫迪政府大力推广瑜伽和印地语等，以复兴印度教文化的名义对印度教特性进行包装，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渗透并推动社会变革。因此，日常化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既不是纯粹的印度教极端主义，也不完全是文化民族主义，而是包括“硬印度教特性”和“软印度教特性”、从激进到温和的连续体。在印度教民族主义日常化的过程中，在各领域不断衍生出文化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技术民族主义、数字民族主义等多种变体。

（二）印度教民族主义日常化对印度内政外交的影响

印度教民族主义日常化的外溢效应十分明显，对印度的内政和外交均产生深刻影响。就国内政治层面而言，一方面，长期占据印度主流意识形态的世俗主义已逐步让位于印度教民族主义，二者呈现此消彼长的发展态势。基于1950年宪法框架的世俗主义是印度立国原则，也是印度多元文化和多族群融合的黏合剂，在塑造民族国家认同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相比之下，印度教民族主义遵从“印度教至上”的价值取向，有悖于印度多元包容的文化传统，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退回到保守封闭的状态。印度历来被视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但如今其民主制度受到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持续冲击，正在沦为“多数主义的统治”甚至威权主义。另一方面，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日常化进一步加深不同族群和阶层的分裂，特别是激化了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对立情绪，导致族群暴力冲突和犯罪事件频发，印度穆斯林等宗教少数群体的政治社会地位日渐下降。同时，印度政治极化和社会撕裂程度不断加深，并不利于印度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也面临着由此带来的一系列风险挑战。

^① “硬印度教特性”（Hard Hindutva）和“软印度教特性”（Soft Hindutva）概念由英国学者爱德华·安德森（Edward Anderson）提出，前者指激进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或印度教沙文主义，后者指相对温和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具有一定的包容性和隐蔽性。

就对外关系层面而言，一方面，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日常化，推动改变了印度对自身国际地位和外交立场的认识判断，加之莫迪政治强人以及印度教民族主义强硬派的决策风格，莫迪政府将“印度优先”“领导性强国”和“世界领袖”等目标融入了印度外交战略，使其对外政策立场日趋激进和强硬。正如莫迪在2014年大选前接受采访时所表示，他的印度教特性面孔将是同其他国家处理外交事务的一个优势，^①莫迪政府的对外政策制定深受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塑造和影响。另一方面，印度教民族主义日常化对印度对外关系的影响中，最为突出的当数印巴关系和中印关系。从印巴关系来看，由于印度教民族主义势力坚持“反穆斯林”和“反巴基斯坦”的一贯政策立场，莫迪政府对巴政策较往届政府更加强硬，导致印巴边境地区冲突屡发，双边关系再度紧张升级，同时，也对南亚地区的安全稳定局势带来显著冲击。从中印关系来看，印度教民族主义势力长期坚持对华敌对态度，与“藏独势力”联系紧密，妄图操纵“西藏牌”牵制中国。同时，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政策立场强硬，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色彩明显。近年来中印边境摩擦冲突多点爆发，双边谈判进展缓慢，两国关系始终处于低位徘徊。另外，莫迪政府大力推行“去中国化”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频繁对华进行经贸打压并试图实现经济“脱钩”。总之，由于莫迪政府对华战略和政策深受印度教民族主义势力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中印关系的不稳定与不确定性。

五、结语

历史事实证明，任何强大的意识形态或社会理念，只有社会环境成熟时才被接受。^②民族主义的日常化既是手段也是目的，最为关键的是对政治社会环境和大众心理结构的改变。从目前来看，印度教民族主义具备十分有利的政治资源和生存土壤，印度教民族主义日常化的程度和范围仍将不断升级，对印度内政外交将产生持续作用和影响。特别是印度教民族主义渗透至教育文化领域，培养“橘黄色化”的下一代，这种深刻效应将在印度未来政治社会发展中逐渐显现和放大。当然，印度教民族主义日常化的过程中也会遇到阻力和挑战，由于具有明显的“反穆斯林”特征，对少数族群的极限施压必然引起某种反弹。同时，各反对党若能有效联合亦将形成针对性的制衡力量。总之，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日常化为我们观察当代印度政治社会提供了独特的切口。

[责任编辑：李丽]

^① Narendra Modi, "My Hindutva face will be an asset in foreign affairs", April 23, 2014, <https://www.narendramodi.in/my-hindutva-face-will-be-an-asset-in-foreign-affairs-3183>.

^② C.P.Bhambhri, *Bharatiya Janata Party: Periphery to Centre*, Shipra Publications, 2001, p.59.